

台湾佛教对社会慈善的积极作用

——以佛光山和慈济为重点

郭天红,王 佳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哈尔滨 150081)

摘 要: 佛教是台湾社会民间慈善的重要力量,不仅在组织动员上能量巨大,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台湾民众的助人心理和慈善文化。佛教的“建设人间净土”、“大乘菩萨行”、“感恩报恩”等理念,融合于现代社会的“回馈社会”、“助人”、“承担社会责任”等伦理中,并与之完美结合,促进了台湾民间慈善的发展。

关键词: 佛教;慈善;台湾

中图分类号: B9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12)03-0187-06

佛教团体是台湾社会民间慈善的重要力量,其善行有效地补充了社会福利不足。许多地方性社会服务都是由佛教团体承担的。台湾佛教推动的社会慈善工作的内容既有急难救助也有长期照顾,涉及贫困、老人、妇幼、儿童、失业者、外籍配偶、疾病等弱势群体。不仅重视在物质钱财方面的资助,而且还在心灵教化方面努力,如心灵抚慰、临终关怀、身心康复,等等。一些大的佛教寺院和社团还在环境保护、国际赈灾、医疗卫生方面特别有作为。这些佛教慈善团体不仅在组织动员上能量巨大,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台湾民众的助人心理和慈善文化。佛教的“建设人间净土”、“大乘菩萨行”、“感恩报恩”等理念,与现代社会的“回馈社会”、“助人”、“承担社会责任”等伦理完美融合,并在实践中卓有成效,吸引很多民众参与其中。可以说,佛教对台湾民间社会慈善的蓬勃发展起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事实上,当代台湾佛教慈善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20世纪40年代到解严期间的整整50年,大多数的宗教慈善机构都是由基督教和天主教兴办的。据统计,基督教慈善机构232个,天

主教慈善机构183个,而佛教慈善机构仅有67个^[1]。20世纪90年代以后,佛教发展迅速,如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大型教团成功崛起,发展迅速,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球五大洲。这四个大型道场,号称“四大山头”——南部星云法师创立的佛光山、东部证严法师创立的慈济功德会、中部惟觉法师创立的中台禅寺和北部圣严法师创立的法鼓山,它们都秉承“人间佛教”思想,积极入世,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和文教公益事业,其中,又以佛光山和慈济的规模和影响力最大,它们都把慈善作为自己的“志业”,是佛教团体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的典型代表。

一、佛光山的慈善事业

佛光山是台湾最大的道场,也是规模最大的国际性佛教团体。总本山佛光山寺,位于台湾高雄,是星云法师于1967年创建的。星云法师,1927年生于江苏江都县,12岁礼栖霞山寺志开上人披剃出家,法名悟彻,号今觉,是临济宗四十八代传人。他被誉为当代“中兴佛教第一人”,实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目前,

收稿日期: 2012-03-26

基金项目: 2011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项目“中国当代佛教慈善活动的新发展”(11D019)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郭天红(196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研究员,从事民族古籍研究;王佳(1984-),女,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宗教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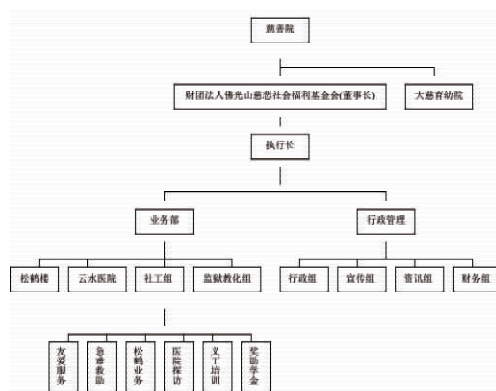
自创办佛光山以来,星云法师把“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作为佛光四大宗旨,凡是利于社会人心的事业,都积极参加。尽管佛光山总是说“慈善只是随喜而做”^[2],并非他们的特色,但其包罗生、老、病、死在内的一系列广泛多元又细致周到的慈善服务着实令人称叹。

在佛光山的理念系统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人间佛教思想,尤其星云大师对人间佛教的诠释、解读、拓展和落实。他认为,人间佛教重在对整个世间的教化。要与时代配合,要能给人欢喜,给人幸福,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凡著书立说、设校办学、扫街环保、施诊医疗、养老育幼、教育文化等等,都是人间佛教^[3]。他强调佛教是和生活为一体的,因此对于慈善和教育事业不遗余力。

在佛光山的慈善理念中,特别突现“给予”和“欢喜”。佛光山把“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方便”作为处事原则,积极入世,帮助他人,奉献社会;把佛教的“脱苦”直接变为“予乐”,把“苦”、“空”的世界建设成“人间净土”。这种理念,通过佛教信徒,也间接形塑了社会伦理和慈善文化。

佛光山把慈善公益事业进一步细分在其慈善、教育和文化三个志业中。如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云水书坊、图书馆、文物馆属于文化院统辖；幼稚教育、普门中学、成人教育、技艺教育、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美国西来大学、都市佛学院、丛林学院、僧伽教育等属于教育院负责；而如大慈育幼院、仁爱之家、松和楼老人公寓、云水医院、慈悲基

佛光山的慈善事业,最早追溯到1964年创建寿山寺时设立的“慈善堂”。星云大师说“慈悲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发心。慈善事业是经常性的、持久性的工作。”^[4]所以在佛光山专门设立了“慈善院”。并在1989年整合所有慈善福利内容成立“财团法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增进社会福利。该会自从核准设立后,组织日益扩大,活动业务遍及整个台湾。其具体的组织结构如下图1:



（三）佛光山的慈善实践

佛光山的慈善事业内容丰富,有完善的机构实体作为依托,采用专业化的服务方法和高效的管理模式,力求提升慈善服务品质。其中,大慈育幼院、松鹤楼老人公寓、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文教基金会等具体的组织运作和服务体现了慈善实践的特点。

慈济功德会由证严法师创立于1966年,从传统济贫逐步拓展至教育、医疗、文化、骨髓捐赠、国际赈灾等诸多领域,以慈善救助闻名全球。它主要由中年女性会员组成,其慈善事业广泛多元,兴办慈济医院、护士学校,运营国际最大的骨髓库,进行急难救助和国际救援等等。可以说,只要是灾害发生的地方,就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慈济人忙碌的身影。慈济会员遍布3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分会与联络点。根据2009年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库公布的信息,自认慈济的信徒约300万,

占总人口的 13.1%。

(一) 慈济的慈善理念

慈济是证严法师一手创立的,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为四大志业,其对佛教入世济度众生、菩萨闻声救苦、建设人间净土等的理解和阐释成为了慈济人的核心价值观。证严法师说:“慈济不仅是静思精舍所推展的业务,凡是佛教徒所做的救济众生、利益人群、造福人生的行为,都是包含在慈济事业中。进一步说,‘慈济’就是佛教实际行动的中心,把慈悲形象化、付之具体的行动”进而“改造人生、净化人心,成为人生现世乐土”。其中,又特别突出“医疗”,认为疾病是痛苦的根源和贫穷的由来,而“布施建医院的功德更大,因为它是佛陀的法身慧命……八福田中,救病功德为第一”^[5]。在证严法师和慈济的思想中,把理论变成“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她格外强调慈济是“做”的法门。

(二) 慈济的志业与实践

慈济事业是从传统的济贫起步的,现在拓展为慈善、医疗、教育、文化等四大志业,六大脚步(加上骨髓捐赠、国际赈灾),共八大具体项目(再加上社区志工和大地震环保)。详见下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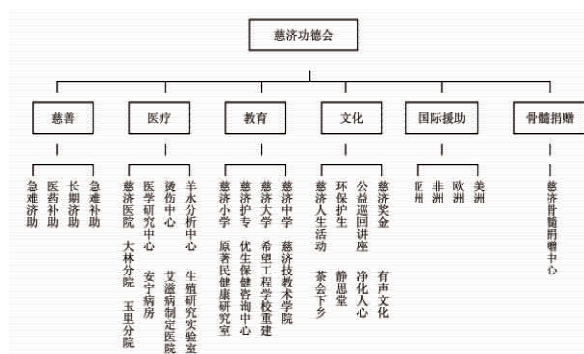


图2 慈济的各项志业

慈济创建初期,把救济对象分为三类:1. 无依靠及生活能力者,施予长期救济。2. 尚有生活能力,但收支不能平衡者施予长期救济必须的生活费用 3/10。3. 暂时生活困苦、度日维艰者,视情酌予救济。经过了 40 多年的努力,慈济基本上形成了长期济助、急难济助、大型赈灾、居家关怀、国际援救等几大慈善类型。截至 2004 年 12 月底,接受过慈济长期帮助的家庭总计 29985 户,当时仍有 2632 户 7787 人继续接受慈济的长期照顾。

他们对救助对象在 3 个月内至少要回访一次,不仅提供物资帮助,还给予精神和心理的支持与慰藉。到 2005 年底,慈济共向全球 57 个国家和地区伸出过援助之手,当时共有 231 个分支机构在开展慈善救助工作。

医疗志业的开展,是慈济发展的重心,其中以慈济医院的落成使用为重大里程碑。1986 年,慈济医院启用,随后又相继成立分院,逐渐形成台东地区广泛的医疗网点。1986 年以前,台湾所有的医院都要求病人在开刀前交一定的保证金,而慈济医院则首先打破了这种规定,这为慈济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也是慈济迅速壮大的重要发展契机。在骨髓捐赠方面,慈济的成就位居世界前列。它运营全球最大的骨髓捐献库,到 2005 年志愿捐赠资料累计有 274495 笔,成功完成了 895 例非亲属骨髓捐赠移植手术。

慈济的教育志业,是从培养医疗和护理人才开始的。当时台东花莲地区医疗条件不足,慈济医院创办之初,医生和护理人才也很缺乏。于是,在 1989 年创立了慈济护专学校,并对原著民学生及家庭困难者免除学费,毕业后安排在慈济医院工作。这样,既培养了医疗人才,也提供了东部地区学生就业机会。据统计,护理教育毕业生约有 43% 留在了东部地区服务,花莲的 1000 多个护理人员中,超过 30% 是慈济培养出来的。慈济在大陆,大力支持希望工程,其项目遍及江苏、安徽、新疆等 10 个省份 32 所中小学。

基于慈济的可喜发展,证严法师又进一步提出了慈济四大志业的“四化目标”,即:1. 慈善国际化,要全球的慈济人培养国际观,结合当地资源,以就近济助受苦的灾民;2. 医疗普遍化,预期在全省各地建设完整的医疗体系,以期能够带动医疗爱的文化;3. 教育完全化,建立起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研究所完全一贯的爱教育系统;4. 文化深度化,加强慈济传播媒体的力量,以把更多的光明种子撒播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净化人心。

(三) 慈济的会员管理与资金运作

1966 年,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时,只有委员 10 人,一个会员也没有。1972 年 5 月,委员也只有 30 余人,会员仅 1000 人。但到 1987 年初,会员一下突破 10 万人,到年底激增至 20 万

人。1990年突破百万人,每月以10万人增长。第一个10万人用了12年时间,第二个10万人只用了一年,可谓神速。1992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1994年,又翻了一番。到2004年底,委员已有22469人,慈济慈诚队员11837人,会员流水号码超过800万人^[6]。如此庞大的会员规模和迅猛的发展速度,得益于慈济卓有成效的组织管理。

慈济募捐系统有会员、幕后委员、委员三层构成。一个委员下面有1-10位幕后委员。幕后委员通常负责5到30户家庭的会员捐款,而委员负责30户以上家庭的会员捐款。他们直接面向慈济会员,除了定期劝募善款、收取会费、介绍新会员外,还时常关切慰问,介入到会员的日常生活中,分享会员的生活经历,帮助其解决家庭问题。这种“会员(劝募)→幕后委员(访贫、查核、劝募)→委员”的运作模式,让加入者具有很强的参与感和成就感,形成慈济模式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委员和幕后委员是慈济实际运行的核心。他们经常以自身所在的社区为基础,组织会员和社区民众共同开展慈善活动,如打扫街道、捡拾垃圾、回收资源、认养公园、整治溪流、关怀老人、照料贫困,等等。

在资金运作方面,慈济的各项善款收支都非常透明。善款不许用于投资生财,也不用于慈济志业之外的其他目的。在筹建慈济医院资金缺额高达数亿元时,证严法师就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2亿捐款。她认为,要通过慈济人一点一滴的辛勤付出,让医院成为我们的医院,而不是被大出资人所控制,防止将来大出资人的要求与慈济理念的冲突。而当慈济医院用地被军方收回时,她也坚持把募集到的善款一一退回给了捐款人,她认为未经捐款人同意,这笔钱决不能挪作他用^[7]。很多会员评价慈济是“实实在在做事”,“钱怎么收来,又怎么放出去,都看得到”,而且慈济人总是自己掏腰包帮忙,“把每一点都一毛一分,交到实际需要的人的手上,没有浪费掉”。正是凭借这样的声誉和影响力,慈济才能迅速发展壮大,几乎“垄断了全岛的慈善资源”。

三、台湾佛教慈善发展成功的分析

台湾佛教慈善内容几乎涵盖了社会服务的各个方面,一些细微的关照也显得格外灵活和人性

化,服务品质、慈善理念、专业方法和管理水平都非常杰出。它们提供的慈善服务“相较于政府公共部门的‘法定福利’来说,不仅逐渐蔓延开来,甚至于在某些服务项目上显示出凌驾其上的发展趋势”^[8],出现了慈善公益和社会服务国际化、全球化的明显特征。佛教团体从济贫、孤老等传统项目,也向教育、医疗、文化等现代公益领域转型,成为推进台湾社会福利的重要动力。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除了佛教信徒在台湾数量众多、佛寺庙宇林立,是开展慈善的重要基础,以下方面也是促进佛教慈善的蓬勃发展的的重要因素:

(一) “人间佛教”成为台湾佛教主流思想

人间佛教思想是当代台湾佛教界的主流思想和指导理念。尤其是佛光山、慈济等现代大型佛教团体,更是把“建设人间净土”作为自己的志业,身体力行。它们号召信徒用佛教信仰指导生活,关注现实生活,积极入世,用“菩萨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特征是积极介入到社会的服务工作中,开展广泛的慈善助人事业。“人间佛教”一改佛教落后愚昧的形象,使得“佛教发展欣欣向荣。……台湾的佛教徒对自己的信仰感到骄傲”^[9]。这是佛教慈善开展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

(二) 佛教人才和慈善服务品质优秀

台湾佛教的变革和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而“大专青年学佛运动”是一个关键因素。今日,台湾佛教盛行,且其势远远超过其他宗教,正是因为佛教界具有众多出色的人才,许多寺院道场不乏大专毕业生,甚至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出家众,而在家众的素质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知识分子都加入其中。一些承担慈善工作的法师和工作人员还特别修学了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心理辅导、非营利组织管理等方向的学位,运用专业化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慈善活动。这样,在理念和方法上,保证了慈善服务的品质。而大量卓有成效的慈善救助,为佛教团体赢得了社会赞誉。

(三) 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稳定

佛教是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佛教慈善的发展其实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证明了,台湾人间佛教和大规模慈善的迅速发展正是与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的。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民众生活富裕,寺院经济得到保证,有能力来帮

助弱者。经济发展,也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心理问题,需要佛教界开展慈善活动和心灵关怀。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佛教的现代变革,人间佛教理念与社会伦理有机融合,激励了台湾民众的助人心理。这种带有佛教内涵的强烈的志愿精神,形塑了台湾民间慈善文化。

(四) 台湾当局鼓励和政策支持

台湾当局非常认可宗教净化心灵的成效,着力推动宗教教诲,开展心灵净化运动。对于有资质有能力的宗教团体,也愿意鼓励它们承接政府慈善项目,并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如佛光山松鹤楼老人公寓就是承接高雄县政府的项目,大慈育幼院中也有很多孩子是政府转介的个案。至于佛光山和慈济的社区关怀据点和在地老人照顾,也是与政府号召相结合,以寺院为中心,负责周围若干社区和里弄。当局对宗教慈善组织进行年度考核,成绩优秀者可获得表彰奖励。这为佛教参与社会服务、进行监狱教化、开展回收环保、从事社区照顾等营造了十分有利的空间。

(五) 全球 NGO 的大规模发展

佛光山、慈济等台湾四大佛教山头都是国际化、全球化的组织。这种现象其实是与全球化结社革命的大背景分不开的。以慈济为例,其成功在于刚好赶上了世界及台湾大量涌现的 NGO 创造政治空间这个契机。NGO 在台湾本土得以用自己的文化政治特点发展。而慈济等佛教组织,正是基于本土特点,提供具体的福利服务,如建设医院、护士学校等。慈济早年以创建医院闻名,而不是建造寺庙,这标志着它融合宗教和道德资源的转型,关注本土的具体福利。医院和寺庙的对比使人们在文化上对 NGO 实践以及慈济的认定有了一个提高。当台湾经历现代化的时候,慈济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其中的背景正是公民道德和公共空间机制的建立,以及相伴随的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10]。

四、台湾佛教慈善的特点和影响

佛教慈善在台湾的发展,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兹举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佛教慈善多以慈善组织或基金会、寺院、居士团体等组织为依托,具有自身独特的理念系统。除了基本的佛教教义外,领导者对成员价

值理念的影响十分突出。参与者和会员的自我认信明显,对组织具有很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

第二,在开展慈善募集资金时,社会动员能量巨大。也注意与当局合作,承担一些政府慈善项目,补充政府福利不足,如松鹤楼、社区关怀据点、云水书坊等。这样,使得慈善的开展非常具有规划性,能很好地嵌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和地区整体福利制度架构紧密结合。

第三,慈善内容多元广泛,注重方法专业化、服务精细化、实践社区化。佛教慈善的内容多元丰富,包括安老、护幼、教育、医疗、济贫、救急等各个方面。在具体实践中,特别讲究专业化的方法,对满足帮助对象的需要细致入微、体贴周到。注重融入当地社区,并结合其需要进行有弹性有针对性的慈善服务,既给社区的困难者以财物帮助和心理抚慰,又结合社区人群特征惠及普通大众。

第四,佛教慈善的能力和声誉很高。佛教团体开展慈善活动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当代台湾佛教慈善的表现更令人瞩目,诚如美国学者魏乐博教授指出的,基督教长老会并没有把台湾的慈善事业全球化,而是地方化了,救助对象完全是自己组织内部的人;事实上,真正把慈善作为公益的新观念是从佛教里得来的,具体说是从佛教慈济功德会发展起来的,它把慈善事业拓展到全球^[11]。

台湾佛教的崛起,尤其大规模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着实是台湾民间慈善建设的重要推力。它不仅促进了民间慈善和社会发展,提升了整体社会福利,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慈善文化,传达了良好的价值理念——如劝善、欢喜奉献、幸福家庭、和谐人际、回馈社会等,激发了人们参与慈善的热情,有利于个人品格和社会道德的进步。佛教慈善为台湾民众提供了参与慈善的多元路径和渠道,培养了志愿服务精神和助人行动,并且把佛教“慈悲”的普世主义价值带到全球各地。

佛教是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佛教慈善是嵌入于整体社会慈善福利中的。台湾佛教慈善的蓬勃与佛教自身的现代变革是分不开的。它们以自身的优秀素质和良好形象,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自身的发展。在具体的慈善实践中,它们非常注重专业化的理念和方法,经常对服务人员和志愿者进行业务培训和技能提高。在台湾社会,各类

NGO 数量众多,宗教慈善组织也不计其数。佛教慈善组织在发展中意识到,要想在竞争中取得立足之地,就不能只是停留在给钱济物的传统阶段,必须变革。同样,大陆的佛教慈善组织也需要借鉴台湾的经验,在组织管理和服务质量上有所突破,合理引导信徒参与慈善活动并形成合力。尤其要重视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努力争取资源,尽快实现自身的慈善组织法人身份。伴随着社会、经济、政策、法律、文化的不断发展,相信佛教团体会为社会福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王顺民.宗教福利[M].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9:47.
- [2]佛光山宗委会.佛光山开山40周年特刊[J].2007,(5):14.
- [3]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蓝图(上)[J].普门学报,2001,(5):9.
- [4]佛光山宗委会.佛光山开山40周年特刊[M].2007,

(5):15.

- [5]释证严.慈济叮咛语[M].台北:佛教慈济文化志业中心,1990:207,359,263-264.
- [6]慈济40年专题:证严法师与慈济基金会[J].经典,2006:45.
- [7]何国庆.考验——证严法师面对挑战的智慧回应[M].台北:商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65,66,77.
- [8]王顺民.宗教福利的初步考察——以“佛光山”、“法鼓山”、“慈济”为例[J].思与言,1994,(03):33-76.
- [9]江灿腾.台湾当代佛教[M].台北:南天书局,1997:9.
- [10]C. Julia Huang. Taiwanese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The Culture Politics of a Global Buddhis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aiwan.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2006.
- [11]Robert P. Weller. Religion, Ritual and the Public Good in China. The Beijing Summit on Chinese 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The Fifth Symposium of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008: 433-446.

[责任编辑 都永浩]

(上接156页)是保证其有效传承的重要手段。

渔猎民族主要聚居在大小兴安岭及三江平原,自然风光秀美,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产业不仅能给民族地区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拓展了民族服饰文化的传播途径。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大批游客前往,他们在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着少数民族独有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在这种感同身受中被认识和传播,尤其是将渔猎民族服饰作为旅游产品,能更直接的传播服饰文化。

再次,重视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最有力的手段。民族地区校本课程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目前,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中学已开发赫哲族语言、传统体育项目、歌曲等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自治旗鄂温克中学开设了“三少”民族歌舞、鄂温克族传统体育等校本课程。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学校开始了鄂伦春语言、鄂伦春民族舞蹈、鄂伦春族民歌、民族手工艺品欣赏及制作等校本课程。民族服饰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应当成为校本课程的内容之一,民族服饰是根植于民族土壤的独特的文化因素,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民族精神、情感

和民族意识,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因此,在渔猎民族服饰纳入校本课程中,不仅要关注其具有的美育价值,更要重视和挖掘其中的历史文化的育人价值。此外,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对子女进行民族文化熏陶,使孩子在生活中有意识地接触服饰文化,形成正确对待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因此,服饰文化的传承应通过学校、社会和家庭等多种途径共同合作与互动,有效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 [1]杨鹃国.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2]戴平.中国民族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44.
- [3]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61-65.
- [4]邓启耀.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456.
- [5]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序言.

[责任编辑 都永浩]